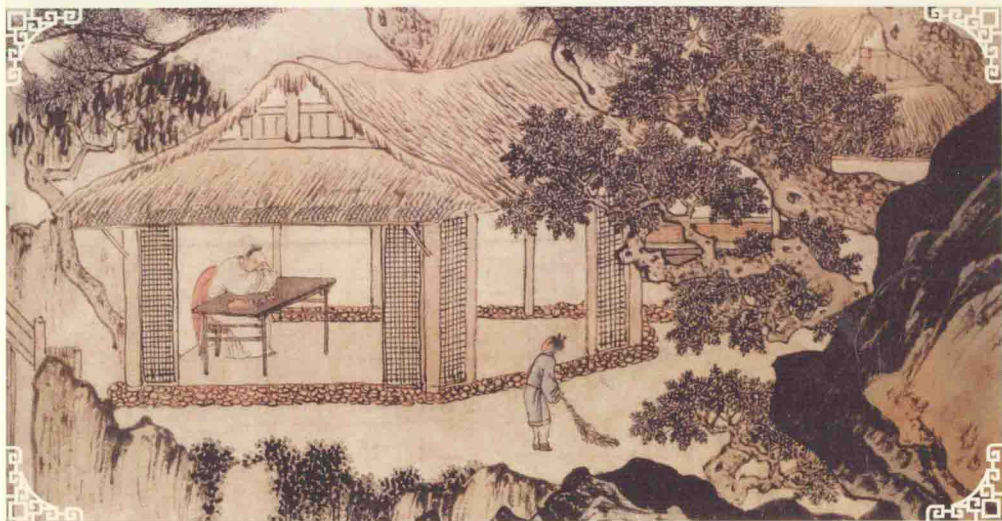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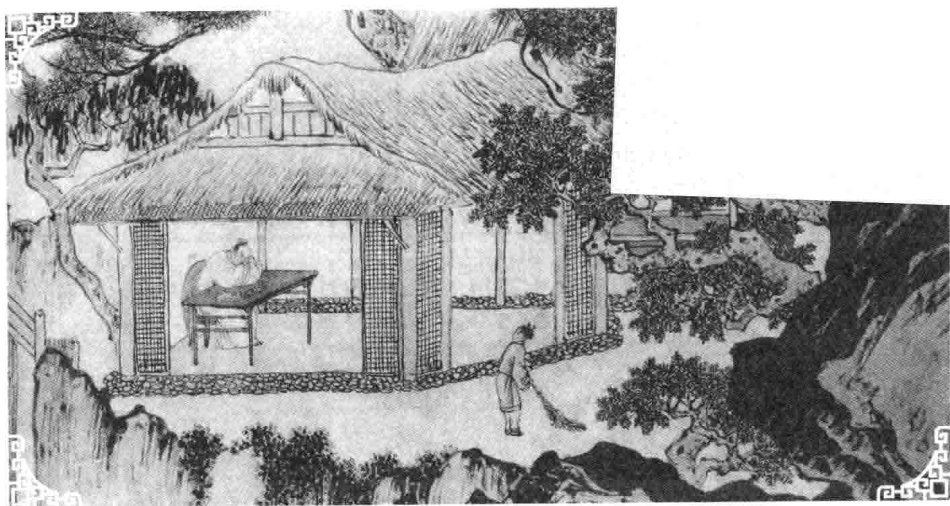
精编本

汉语词根辞典

顾问 李行健 编著 黄岳洲

汉字之妙 一典道破

攀 华语教学出版社



精编本

汉语词根辞典

顾问 李行健 编著 黄岳洲

汉字之妙 一典道破


 华语教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词根辞典/黄岳洲编著. —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138-0815-6

I. ①汉… II. ①黄… III. ①汉语—词源学—词典 IV. ①H139-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56593号

出 版 人 王君校
编 著 黄岳洲
责任编辑 李凯声 张 敏
装帧设计 胡亚南
印刷监制 佟汉冬
出 版 华语教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百万庄大街24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68995871 010-68326333 (传真)
编辑部热线 010-68421318
网 址 www.sinolingua.com.cn
电子邮箱 fxb@sinolingua.com.cn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32开 (880×1230)
印 张 17.5
字 数 800 (千)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8-0815-6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汉语词根辞典》序

中国训诂学会会长 李建国

词根，又称语根或词源，是事物命名取义的初始语言形态。研究词根及其孳乳发展的学问称为语源学或词源学，旨在原始要终追寻事物命名之由，探讨语词的源流和系统，本质上是一门历史语言科学。在中国，探求语源的历史由来久远，最初是以训诂学中声训的形式出现在典籍的正文中；如《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就是说“政”得名于“正”，为政者必先修身正己，方能推己及人。又如：“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诗经·大雅·思齐》）所以孔子强调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孟子也说：“征之为言正也。”（《孟子·尽心下》）可见在孔、孟看来，“正”、“政”、“征”音同义通，“政”、“征”均得名于“正”。从语源学观点说，这三个词当为同源词。汉代是儒家经学一统天下的时代，汉儒解经，口说流传，声训风气尤盛，注释训诂、辞书训诂中的声训屡见不鲜，班固的《白虎通义》，刘熙的《释名》，更是用声训方法阐释“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义”的事物得名之由的专书。至于“累十名而同条贯”系统地推求同源词，虽有北宋王圣美类聚谐声字由声符求义的“右文说”开其端，但要直到清代乾嘉时期才初具规模。

清代汉学复兴，因了古音学的发明，研究得法，训诂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著名的经学家们在研究文献语言中发现语词的音义关系有规律可循，于是语源问题重新引起关注。戴震首先揭示了古人以声为

名的真谛，他的弟子段玉裁进而注意到声义同源，晚年更认为“以声为义”“此可以窥上古之语言”^①。和段氏同时的程瑶田作《果羸转语记》，专门记述了音声相转、字形变易而人物形体初皆一名的语言现象。王念孙则把因声推源看作毕天下之能事，在《释大》一文中要将经典中的材料按照声义相依、义随声转的原则作分门别类的研究，以求语言展转流衍之迹。可惜他们暮年方识天命、壮志未酬便遽归道山了。

清代乾嘉学者不同程度地揭示出一些语言学原理。但受历史条件和学术风气的局限，他们未能从语言学的理论高度探讨词义和词汇发展的规律，正如章太炎所指出的：“《说文》列字九千三百五十有三，然或自一义引申，累十名而同条贯，诸家多未能昭察也。”^②从理论上探讨汉语词义引申和词汇发展规律从而建立现代语源学的是“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受西学的感召，早在1902年，章氏就认识到：“中国寻审语根，诚不能繁博如欧州，然即以禹域一隅言，所得固已多矣。”^③后来在《新方言序》中进一步阐述道：“世人学欧罗巴语，多寻其语根，溯之希腊、罗甸，今于国语顾不欲推见本始，此尚不足齿于冠带之伦，何有于问学乎？”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爱国保种的动机，他发愤著述，弘扬国学，以回应西学的挑战。

章太炎根据《汉书·艺文志》“六书皆造字之本”立说，著作《转注假借说》，在批判地总结前人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从语言的角度对许慎的转注界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授，考老是也”作了全新的解释：“类谓声类，不谓五百四十部也。首谓语基，不谓凡谋之属皆从谋也。……夫声韵纽位不同，则非建类也；语言根柢各异，则非一首也。”^④他对比地说：“许所谓首，以形为之首也；吾所谓首，以声为之首也。许所谓同意相授，两字之义不异毫厘，得相为互训也；吾

① 龚自珍《最录段先生定本许氏说文》，见《龚自珍全集》第258页。

② 《小学答问》。

③ 《致吴君遂书》，转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第142页。

④ 《转注假借说》。

所谓同意相受，数字之义成于递衍，无碍于归根也。”^①语基即语根或词根，就是所有同源同族词的共同意义达到最抽象和最概括程度的要素，是最初表示共象的语音形式。在同一种语言的发展中，由词义引申而产生的新词新字，在语音上往往相同或相通，同属于某一语源，这就是转注造字——文字孳乳的法则，也即以文字为标志的古汉语词汇发展的法则。章氏举例说：“如立禺字为根，禺亦母猴也。猴喜模效人举止，故引申之，凡模拟者称禺。《史记·封禅书》云：‘木禺车马一驷’是也。其后木禺之字又变作偶，《说文》云：‘偶，桐人也。’偶非真物而形寄焉，故引申为寄义。凡寄寓者非能常在，顾适然逢会耳，故引申为逢义，其字则变作遇。凡遇者必有对待，故引申为对待义，其字则变作耦矣。”^②可见他所说的转注字实质上就是同源字（词）。

转注和假借，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章氏说：“转注者，繁而不杀，恣文字之孳乳者也。假借者，志而如晦，节文字之孳乳者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负相待，造字者以为繁省大例。知此者希，能理而懂之者鲜矣。”^③章氏的转注、假借说概括了词汇发展的三种情况：“语言之始，义相同者，多从一声而变；义相近者，多从一声而变；义相对相反者，亦多从一声而变。”^④第一种是义相同而制字，主要指同一语词因方言殊异或古今音变而制字的情况。^⑤第二种是义相近而制字，主要指因词义发展变化派生新词而制字的情况。第三种是义相对相反而制字，指的是为由同一语根派生相互对立的词而制字的情况。

章氏的《转注假借说》把转注、假借看作“文字繁省之例，语言变异之端”^⑥，紧紧抓住语言结构两极性的特点，“音义互治，不间飘忽”，

①《论语言文字之学》，见《国学讲习会略说》。

②《语言缘起说》。

③《转注假借说》。

④《转注假借说》。

⑤ 参见陆宗达《六书简论》，《北京师范大学报》1978年5月。

⑥《小学略说》。

着重总结了汉语词汇中音变和义变的规律，并从语音和语义的结合上探讨语源，作为著作《文始》的理论基础。他说：“中国文字，自古文小篆以至今隶，形体稍减省，而声音、训诂古今相禅不知双声、叠韵者，不可识音变之条；不知转注、假借者，不可与义变之例。故虽习用今隶，而不得无溯其源于古文小篆。”^①在他看来，文字形体古今递变，而语言则以其固有的传统为依据一脉相承，不绝如缕。这种语言的延续性，表现在音变上是双声叠韵，表现在义变上是转注和假借。只有兼及音义的变化，庶几可得古今语言的源流之迹。

语源学是研究语词历史来源的科学，由文字的音训上考察语言的流变和词汇的系统，不但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能的。这是因为：一方面，语言的活动往往不是人们所能观察到的，语言学家就应该注意书面文献，只有书面文献才能使他们认识过去的语言或远方的语言；另一方面，“文献语言以汉字的发展规律为语言发展的准绳，虽不能宛尔合符，但是声义之间并没有很大的距离。”^②历史语言学尊重文献材料，尊重由文字的威力造成的既成事实，即古代的书面语（主要是文言文）长期保持的相对的独立性，即使对于金甲文所提供的资料“掇摭不全”，也“无伤于故训也”^③。

《文始》根据声义相依的原理从语音的关连上证明词义的相互联系，从声音和意义两方面寻求词在语源上的联系，展现了词汇发展的规律。章氏以《说文》初文兼作字根和语根，“讨其类物，比其声韵”，“形体声类，更相扶胥”，“以一形衍为数十”^④，得出汉语文字发展规律约有二例：一是变易，“音义相讎，谓之变易。”指语词的音义相同而形体有别的情况，主要讲因古今语变和方言殊异而制字的同义词的发展，大致包括本义相同的同义词、通局有别的同义词和方言同义词。二是孳乳，“义自音衍，谓之孳乳。”指语词的类型相同而音形小变由

①《论汉字统一会》。

② 陆宗达《训诂简论》第114页。

③《文始·叙例》。

④ 同上注。

同一语根派生新词的情况,主要讲同源词。顾名思义,同源词必须同源,必须是声音和意义在历史上具有同一来源。换言之,同源词必须同时符合其音变条例和义变条例,二者不可或缺。

语源学既然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语言的非历史的静态研究(或曰共时研究)就必须和语言的历史研究(或曰历时研究)结合起来,并且只有成为历史解释的出发点时才是完全合理的。因为语言,正如德·索绪尔所说:“每一时刻,它都同时包含一个建立好了的系统和一个演变;每一时刻,它都是一个现实的制度和过去时代的产物。”^①《文始》以《说文》为具体材料,展开对上古汉语词汇系统的静态描写和历史描写。例如:《说文》:“土,地之吐生万物者也。”“土”的最初命名取义已无法查考,这时只是造字的意图,是对“土”所代表的客观事物的概括反映。但是客观事物本身是复杂的,具有多种多样的特征,事物彼此之间又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人们在现实中就有可能根据不同事物之间的形状、颜色、性质和功能等特征的共同之处用称呼甲类对象的词去称呼与此有联系的乙类或丙类对象,使一个词同时具有多种意义。“土”能生长万物,是人类赖以休养生息的地方,所以“土”有“居”义;《诗经·大雅·绵》“自土漆沮”,注:“土,居也。”太古时期,人们辨方正位,体国经野,都从地形开始,所以“土”被用作法度、度量。《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注:“土其地犹度其地。”“土”色以赤黄为正,所以又用“土”色称赤黄色,“土”又有“赤黄”义。“土”为大地,主生万物,所以又作土神之称。这样,在语词的现实应用中,用“土”的性质、功能、颜色等特征去称呼有关事物,使它同时具备了“量度”、“法度”、“土色”、“土神”等意义。这些意义最初是由语境中“土”的临时用法和功能形成的,“土”在承受了这些新义后并没有改变其本义,因此它仍然是一个词,保持着词的质的同一性和来源的同一性。这种在同一时期呈现出的互有联系的词的各种意义,是语词的相对静止状态。但是语言是变动不居的,一个词的

^① 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264页。

使用和所承受的意义既不是无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和人们认识的深入，词义由粗疏变精细，由含混变准确。经过长期累积性使用，其中有的意义为社会所公认，成为该多义词的固定义项，有的意义则突破本义和语音形式的束缚独立出来，成为与原词音义相关而本义有别的新词。这些新词从历史上看虽然具有来源的同一性，却都是由同一个词分化派生出来的，但是已经发生了质变。发生了质变的词就不再是同一个词，也就不再保持其质的同一性。“土”的各种意义，由具体语境的临时用法经过反反复复的使用，逐渐演进为固定的意义，进而独立成词：“法度”、“量度”之义孳乳为“度，法制也”；“土神”之义孳乳为“社，地主也”；“土色”之义孳乳为“赤，南方色也”。这些词开始统称“土”，“以意命号，无有准则”；时日渐久，欲为分别，于是产生“度”、“社”、“赤”三个新词，“令音皆小别，然后无淆讹耳。”^①这三个词虽由“土”的本义引申发展而来，与“土”音义相关，具有来源的同一性，但它们的本义已经发生了质变，成为“土”的各具特性的同族词了。这就是语词的历史状态。《文始》以词汇为对象，以词义为中心，通过词义的静态描写和历史描写，纵横交错，展示了词义和词汇发展变化的系统性，使貌似一盘散沙的汉语词汇显现出本有的条理。

《文始》是汉语史上第一部理论初具、条例缜密、方法科学的语源学专著，开辟了现代词源研究的坦途。此后章氏的弟子沈兼士有《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用右文说建立比较训诂学，即字族学，拓展了词源研究的空间，但仅仅是示例性质的探索，并无后续性的研究成果。

真正应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汉语同源词、并以辞典的形式普及于社会的是语言学大师王力先生。1978年他发表《同源字论》，剔除文字形体的干扰，严格语音、语义的界域，使真正的同源词严密就范。在此基础上，又于1982年推出中国第一部《同源字典》，

^①《文始》卷五。

既填充了中国辞书界的空白，同时将汉语词源学推进到现代语言学的新阶段。

自王力《同源字典》问世以后，三十餘年来，汉语同源词的研究虽不外拾遗补阙、匡谬正误而继有发明，但其广度和深度已有长足的进步：专著如刘钧杰《同源字典补》和《同源字典再补》，张希峰《汉语词族丛考》、《汉语词族续考》、《汉语词族三考》，殷寄明《汉语同源字词丛论》等，至于单篇论文，更是无计其数。然而时至今日，复为同源辞典并独立名世者，尚不一见。

姑苏黄岳洲先生，可谓有心人也。有鉴于此，他适时地将几十年来有关同源词的思考、研究、切磋、磨炼、积累的成果编纂为《汉语词根辞典》，意欲“初步寻找汉语的词根或声义一体及其流变，以便大大有利于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学习或研究汉语和外语，也大大有利于外国人学习或研究汉语和外语”，以实现其“中国创造”的学术美梦。

黄先生以“词根或声义一体说”为其著作《汉语词根辞典》的学理依据，认为“汉语词根或声义一体符号的构建形式在汉字的自身，词根是形义的基础，从词根上派生出一系列新义来，从而形成彼此同源或同义词组”。因此，他以语言为对象，由代表词根或声义一体的符号立目，按照词义或引申或比喻的路径孳乳新词的规律，收释汉语词根或声义一体的语词凡920个左右，结构成辞典一书。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离婁下》）学术的演进，一如江河长流，后来居上，推陈出新，归入深广无涯的大海。毋庸讳言，黄先生的著述是大抵传承章太炎以来的现代语源学理论、方法而有所恢宏：一是突破《说文》小篆形体的局限，兼收金、甲、钟鼎文字研究成果，对词根或声义一体的符号详加诠释，更加真实地反映了汉语同源词的历史轨迹；二是不少词目的注音由今音扩展到古读，从古今音读的比较分析中达成“因声求义”、“因声推源”的训诂极致；三是除古文献资料外，广泛征引方俗语言作为书证，

使古语与今语、通语与方言相互贯通，展示汉语同源词的基本风貌；四是行文平实，深入浅出，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大有利于中外汉语的语言教学。

黄先生青年时期即投笔从戎，御侮报国，后入北京师范大学深造，亲炙于黎锦熙等语言学名家大师，具备了深厚的学养；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事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勤奋刻苦，孜孜以求，硕果累累，著作等身，称得上是“有学问的革命战士”。黄先生现已八十五岁高龄，依然身体硕健，笔耕不辍，是笃志好学、信守善道的中国读书人的榜样。黄先生是我的前辈学长，自上世纪80年代结交以来，每以大作见赐；只是我生性疏懒，拜读之余，曾不能妄加评介。今先生《汉语词根辞典》即将付梓，嘱后学为之作序。先是由李行健先生代为致意，后复以电话叮咛，其谦虚礼下之心，殷勤待人之情，虽古之君子，无以尚之。由是不敢推辞，冒昧地写了上面的话。是为序。

后学 李建国 谨识

2013年10月26日于北京居易斋

自序

黄岳洲

本书的特点是初步寻找汉语的词根或声义一体及其流变，以便大大有利于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学习或研究汉语和外语，也大大有利于外国人学习或研究汉语和外语。重点是初步建立汉语的词根或声义一体的系统。难点是处理许多汉字的古今字、异体字和叠床架屋的字；例如“洲”跟“州”，“𠂔（𠂔）”也是“州”呀，“掙”跟“爭”，“爪”也是“扌”呀，“煜”跟“昱”，“火”也是“日”呀。汉字中有许多形体讹变的字，更加构成了词根或声义一体的系统研究的巨大难点；例如“失”是从“手”、“乙”表声义，形体讹变了；又如“帝”讹变为“商”，等等。笔者曾经几次应邀在国家教育部讲师团工作过，在全国各地对许多大学中学讲学，又参加过国内外许多学术活动。本书的观点和资料几十年来经过国内外许多专家、读者研究挑剔，或删改或确认或批评和建议，也许可以对中外学者学习并运用汉语和外语提供一种新途径、新形态、新规律，我也更能体会到“学然后知不足”！我要弘扬国学，回应西方少数学者说“汉字是单音节无规律”的挑战。

我国古代讲到词根或声义一体的系统研究的著作有《白虎通》、《方言》、《释名》、《说文》等，但讲得更多更准确的是甲骨文、金文和钟鼎文的原始材料。《说文》所说的“会意兼形声”便是“声中有词根”或者声义一体，这完全讲对了，可惜字例极少，免不了使我们仍旧处于比较蒙昧的状态，被少数人乱说什么汉语是单音节没有什么词根或声义一体的系统研究可言蒙蔽住。近代当代著作中，朱骏生先生有《说文通训定声》，沈兼士先生有《右文说及其在训诂学上之推阐》，朱起凤先生有《辞通》，章太炎先生有《文始》和《新方言》，杨树达先生

有《积微居甲文说》，先师王力有《同源字典》，刘盼遂先生有《〈六书转注录〉甄微》，刘又辛先生有《〈右文说〉说》，陈楚生先生有《金文常用字典》，等等。国外的高本汉有《汉语词族》。《汉语大词典》更有许多宝贵的资料可以学习、研究和借鉴。解释一般所说是汉语的形声字的权威著作如《说文》：“仕，学也，从‘人’‘士’声。”这种说法很可以供研究。“仕”不但是形声字，而且是“从‘人’从‘士’，‘士’亦声”，会意兼形声。“士”表示了声（voice），同时表示了义（mean），《说文》：“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白虎通·爵》也说：“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士”是“人”中之“士”，从“一（地）”从“十（上下左右）”，指事，亦即古代所说的了解许多情况的会为皇家办特大的事的上层阶级“人”，如“名士”、“学士”、“博士”、“士官”、“士绅”、“士族”，而不是“民（奴隶）”。因此也就是“仕”，如：“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我们应该而且必须特别注意汉语里很多形声字的所谓声符是表声，同时也表义，声义一体，构成一组逻辑的概念及其相互制约关系。又如《论语·颜渊》：“政者，正也。”“政”是奴隶主用“攴（武器）”扑打奴隶使他们走入所谓的“正途”，“正”是词根或声义一体。又如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等书的“芒”、“茫”、“望”、“忙”、“忘”、“慌”、“谎”、“盲”、“育”等，“亡”是词根或声义一体。而且，《说文》里不少会意字也是会意兼形声，例如“信”就是从上层阶级的“人”，“言”表声义，是“人”的言论，“民”在远古没有社会地位，不是“民（奴隶）”的言论。“言”在“疑”纽三等，“信”在“心”纽三等，“疑”、“心”古读不少相通，“人”只是表示类别而已，它使得词根或声义一体的“言”的外延缩小，形成类概念和类种概念。会意字也可以作为词根或声义符号，例如从“宀（居室）”从“豕”是“家”，“女”有“家”是“嫁”，“禾”有“家”是“稼（栽种）”。象形字更加可以作为词根或声义一体的符号，例如“巴（大蛇）”象蛇吃大象的巨大而又伟大的形状，远古是声义一体。作为比喻，“爸”也就是执斧养活全家的“父”亲，“父”古音读如“巴”。“杷”是圆饼，“疤”是病痕，“笆”是圆状的竹制用具，“杷”是果实如“巴”。先师黎锦熙

先生有宏文《爸爸考》。指事字也可以作为词根或声义符号，如“又”是“又（手）”中有“丶（交错物）”，亦即“手”持交错物，“权”是“木”又，“钗”是“金”又，“袂”是“衣”又，“汧”是“水”又，“岷”是“山”又。转注和假借是字的用法，更加是词根或声义一体符号的体现，可以参阅朱起凤先生的《辞通》和李行健先生主编笔者主审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汉语异形词规范词典》。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倡导宋朝人王圣美《字解》的“右文”说亦即词根或声义一体说：“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也就是“词根或声义一体的符号在右”。可惜《字解》失传了！！这是人类知识产权的世界性的历史性的无价瑰宝！！拙著所说的词根或声义一体的符号不只是都在右边，上下、前后、左右中都有。词根（root）或声义一体的符号位置不同或形体变了，意思也会有差异，亦即内涵也会有变化，例如“悲”是一阵阵哀痛，“悱”是想说却说不出，《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但是“非”表“心非”的声义一体符号的大同的前提不变。是不是每个声符都只是表示了某个固定的义？不一定，例如“公”跟“工”就没有“义”的维系。是不是字义或内涵增加了一定也变声？也不一定，例如“闻”是从耳朵听增加到用鼻子嗅，跟声音变化无关，但可以说绝大多数的汉字声符是同时表示了“义”。这些声义符号就像英语、俄语、法语等的词根，例如英语的“help”是“帮助”，以下的“helpful”、“helping”等的意思就以“help”为基础。汉语词根或声义一体符号的构建形式在汉字的自身。词根是形义的基础，从词根上派生出一系列新义来，从而形成彼此同源或同义的词组。说得远些，汉语的“中国（china）”，跟辽语的“契丹”、印度语等的“支那”、俄语的“Китай”是同源的。我们的紧迫任务就是迅速找出汉语的词根或声义一体的符号系统，既有横向的联系又有纵向的源流，逐步完善并为广大读者所接受，从而作为进一步学习或研究的基础或条件。把《方言》跟《说文》作比较，《方言》之所以优于《说文》，就是由于前者以语言为对象，后者一般是以文字为对象，寻找词根或声义一体的符号就难了。拙著所说还不只是

“右文”的今读而已，不少研究对象还要扩展到声义一体的符号的古读，古今彼此比较、分析，求得所谓“得其音斯得其义矣”。从猿到人，从猿人到原初汉人，是先有声后有义再有形，或者声和义同时产生，声中有义，义载于声，就成为共有声义一体的符号的一对孪生姐妹。声义并生，就有了所孳乳的声义系统，就有了古声纽、古韵部和声调、等呼、清浊等的演变及其分化。考虑了以上几点，对于研究《汉语词根辞典》可以思过半矣。1980年秋天由笔者参与策划和主持的在苏州市南园召开的一次全国训诂学大会上，先师张世禄先生、王力先生等语言学大师都大力鼓励全国学者努力寻找出汉语的词根或声义一体的系统，并因此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汉语的可供查阅的词根或声义一体的系统来^{①②③}。张世禄先生说：“把‘教’、‘效’、‘校’、‘学’、‘觉’等联系起来解释……这种简单的解释似乎没有像近代那种定义式的解释明确，但实际上这种声训的方法不是单个词儿的解释，而是联系了几个或一批的同源词，使得我们的读者对于这几个或一批的词儿获得一个共同的概念。”（《关于汉语历史词汇学和〈汉语大词典〉的编写工作》）王力先生说：“要把声义词典为读者所应用，这种千秋大业真的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吴文琪先生说：“讲同源词可以举一反三。”王先生又说：“学习词根或声义系统可以举一反三！！”当场许多训诂学专家笑着说：“大大可以举一反三或十以上呢！”张、吴、王三位大师对汉语的革新研究给予了金钥匙！！其实呢，三位大师主要是交代任务而已。早在1933年，沈兼士先生就发表了《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沈先生认为“右文说”既可以认识并比较字义，探究语言的发展变化而不被字的形体所拘泥，又可以探索词根找到演绎分化的基础，而不是像《说文解字》那样除去“会意兼形声”以外都只是致力于研究汉字的形体和用法（转

① 参阅黄岳洲著《古诗文名篇难句解析词典》中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学长的序言和黄岳洲的自序，上海辞书出版社、华语教学出版社。

② 李行健先生主编黄岳洲主审的《现代汉语异形词规范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③ 参阅黄岳洲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名篇鉴赏辞典》（五大卷），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华语教学出版社（上下册）。

注、假借)。继而，先师魏建功先生说沈先生“把形、音、义联系起来研究”突破了《说文解字》因形取义的旧法。我谨认为这是汉语训诂学、语义学、文字学、音韵学、修辞学甚至逻辑学等的一次综合性的大革命，也是对学习和研究外语的一次大革命，因为“词根或声义一体说”是一座辉煌的桥梁。从词根系统或声义一体的系统看，表声义的符号是源，是概念的内涵，在声义一体彼此维系的原则下词儿的排列组合及其沿革是流，是概念的外延。或者说词根或声义一体是前提，是作判断的条件，所衍生的是判断亦即结论。我们既要正视个性注意来源，又要把握共性剖析彼此关系获取流变。饶有趣味的是章太炎先生曾经说“远古‘爸爸’、‘妈妈’不分”，有位大学者、大文学家却马上讽刺说：“那么男人就是女人！！”太炎先生说的是词根或声义一体啊！清朝皇帝说“皇阿玛”、“皇阿妈”就是“皇阿爸”。“爸爸”跟“伯伯”也不分，“吴泰（太）伯”也就是“吴大爸”。而且，“男伯伯”跟“女伯伯”也不分，我的故乡扬州方言区的靖江市就叫“姑母”为“伯伯”。而且，远古“伯伯”跟“姆姆”、“婆婆”也不分。再看一岁左右的孩子，都是先喊双唇音“爸”，“爸”中有“妈”，后来就出现了鼻音“妈”。如前所说，双唇音的“巴（bā）”就是词根或声义一体的记载。拙著的词义扩展总体说来一般是两个途径：或者是引申，或者是比喻。引申是扩展，抽象些，比喻也是扩展，具体些。两种情况、两个概念常常是浑然一体，所谓辩证统一。引申例从略。作为比喻的如，“八”是分向两边的象形，“分”从“刀”，“八”表声义，是分向两边。又如“扮”从“手”，“分”表声义。又如，“盼”是“目”分，“忿”是“心”分，“纷”是“丝”分，“雾”是“雨”分，“汾”是“水”分，“粉”是“米”分。引申和比喻不怎么分得清楚但主要是比喻的如，“齊（齐）”是“禾穗”平整，“济”是“水”平整；又，《庄子·齐物论》：“厉风济，则众窍为虚。”“风”平整也叫“济”。后来又造了一个“霁”，是“雨”平整，如“雨霁”。词根或声义一体有时候形体和读音也大有变化，例如“川”就是“𣶒”，就是“乡”，就是“州”，就是“水（𣶒）”，就是“调侃”的“𣶒”的“𣶒”，等等。还有词根或声

义一体的重合衍生形式，如两个“日”是“昌”，三个“水”是“淼”，四个“又”是“叕”。尤其饶有趣味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在苏中解放区参加印刷并张贴标语对联，对联中有“联合草头将，打倒水边王”，“草头将”、“水边王”一指“蒋介石”，一说“汪精卫”，都是传统所说的或者人们所认为的“强梁”。这里妙不可言令人一再拍案叫绝的是“将”、“王”二字都是词根或声义一体的符号！！在理论上，我们不妨再以“𡵓”表示“浅小之物”来说明“残”、“栈”、“戔”、“盞”、“戕”、“戕”、“贱”、“浅”、“钱”、“线”、“践”、“笺”、“戛”、“戛”、“溅”、“骹”等是词根所构成的“同意相受”，也就是“转注”。“词根”也就能“建类一首”。本书经过几十年的辛苦磨炼，吸取国内外无数专家、读者的意见，初步确定了汉语词根或声义一体是920个左右。但毕竟只是“示例”而已。

以下图示：